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蔣 斌、何翠萍 主編

人類學組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國家、市場 與脈絡化的族群

蔣 斌、何翠萍 主編

人類學組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蔣 斌、何翠萍

主編。-- 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民 92

面；公分

ISBN 957-671-961-5(精裝)。-- ISBN 957-671-962-3(平裝)

1. 族群 — 論文 2. 華人 — 論文

546.59207

92003777

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主 編：蔣 斌、何翠萍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排 版：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94 號 11 樓之 5

印 刷：元震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 159 巷 5 號 2 樓

展 售 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 886-2-2652-3300 F: 886-2-2652-3378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 2 段 138 號 10 樓之 1

T: 886-2-2321-9033 F: 886-2-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四分溪書坊

台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地下室

T: 886-2-2783-9605 F: 886-2-2783-9620

Email: kk1133@saturn.seed.net.tw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

T: 852-2609-6508 F: 852-2603-7355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定 價：精裝新台幣 550 元 平裝新台幣 50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GPN: 1009200375 ISBN 957-671-961-5(精裝)

GPN: 1009200374 ISBN 957-671-962-3(平裝)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總序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九日在臺北南港院區學術活動中心揭幕，會期前後三天至七月一日閉幕。這一次漢學會議的舉行距離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的上屆大會已有十四年之久，而與第一屆大會的舉行則已相隔廿年的時間。在這樣一段長久的時間內，國內外漢學界已有相當的成長與變化，正如本院李遠哲院長在開幕致詞中所說的：「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視野更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論與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乃結合人文學科各研究所，經兩年時間的籌備而召開本屆大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這一擴大的學術聚會，讓國內外漢學界研究同仁再有一次廣泛討論及交換意見的機會，以便共同探討籌劃「漢學研究在廿一世紀的新方向」。

第一、二兩屆國際漢學會議是由本院的三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共同參與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參加籌備的單位除去上述三個研究所之外，又增加了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而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中亦邀請多位國內大學相關學門的教授參與。在會議內容的分組上也有變動，第一屆會議共分為六組，第二屆會議則改為五組，本次會議則增加為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學、族群關係（人類學組

一)、信仰與生活(人類學組二)等七組之外，並有「漢籍數位典藏研討會」合併在會議中舉行，以展示本院推動現代資訊科技在漢籍典藏與搜集上的應用成果。在會議節目程序的安排上，本屆會議也略有創新，除去有兩次大會特別演講外，並有十四次「主題演講」以配合各組之下再分出的研討主題，分別邀請與主題相關的資深學者作演講，以突出並導引各研討主題的意義與研討。最後各組並各有一場綜合討論，以整合各領域研討的意見。

本屆大會共有國內外漢學研究者三百餘人與會，提出論文二百一十一篇。前兩屆漢學會議均將會議論文分組編印成冊出版。本屆會議各主題下之論文都具相當專業性與系統性，籌備會與各組主持人均希望早日刊出。茲為編輯會議論文出版事務，特由「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其副秘書長，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寬重教授及執行秘書、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教授，分別擔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與各所代表何大安、何翠萍、黃克武、李豐楙、邱澎生等教授共同組成編輯小組主持編輯出版事務。邱澎生兼任此編輯小組秘書，與助理李雅玲小姐共同襄理協調聯繫事宜。各分冊之主編則由劉翠溶、石守謙、邢義田、劉增貴、臧振華、陳國棟、黃克武、鍾柏生、何大安、何翠萍、蔣斌、林美容、李豐楙、劉述先等教授分別擔任。本屆大會論文集在經費困難與出版形式之議定極費精神的情況下得以陸續出版問世，都是編輯小組同仁與各分冊主編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本人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至深謝忱。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得以順利召開與完滿達成，首先要感謝本院李遠哲院長與楊前副院長國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同仁們均十分感激。「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石守謙、李壬癸、呂芳上、徐正光、張玉法、黃俊傑、黃啓方、黃應貴、劉述先、劉翠溶、鍾彩鈞、戴璉璋、龔煌城諸教授，在籌備期間極備辛勞，而大會秘書處在黃寬重與王明珂兩位教授的領導下，在開會期間更是日夜不休地工作，更是

令人欽佩，本人與大會籌備會副主席杜正勝院士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與會漢學界同仁也向他們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主席

李亦園 謹誌

民國 90 年 12 月

目 錄

總序	李亦園	i
導論	何翠萍、蔣 斌	1
主題演講		
Questions of Identity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Wang Gungwu	31
論文		
徘徊在漢與非漢之間： 北川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王明珂	59
閩西東山蕭氏的宗族文化及其特質	楊彥杰	105
Rethinking Sinicization: Processes of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John R. Shepherd	133
十八及十九世紀台灣福佬客家械鬥	許文雄	151
A Minority among the Minorities: The Han Chinese in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in Southwest China	Chuan-kang Shih	205
Global Science, National Politics and Assimilationis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Frank Dikötter	251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rapeutic Practices in Yunnan's Lijiang Basin: Tracing out Naxi and State Narratives of Modernity in Socialist China.....	Sydney D. White	279
“Dissecting a Sparrow”: Ethnology, Locality, and the Study of the Jinxiu Yao	Ralph A. Litzinger	339
Derivative Discourses and Ethnic Resources: Theme Parks and Indigenous Politics in China	Dru C. Gladney	383
Ethnicizin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Miao, the Media, and the Market ..	Louisa Schein	437
The Best of All Worlds? Hybridity of Baba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Jürgen Rudolph	473
Chinese-Indigenous Relations in Sarawak: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aniel Chew	503

《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 1-29

導 論

何翠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蔣 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一、人類學的族群與認同議題以及本書的旨趣

本書所收錄的論文，從分散在東南亞、台灣、中國各地方的華人、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互動，來討論不同政治經濟歷史脈絡下的族群關係議題。所有的論文，都來自「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人類學組(I)的研討會。¹除了王賡武院士的論文原為「族群關係組」的主題演講之外，其餘論文則各自發表在五個議題小組中，包括：徐正光教授組織的「福佬與客家：族群關係基礎範式」、麥留芳教授組織的「華人與土著：海外的族群關係」、蔣斌組織的「華／漢與南島民族：脈絡化的多數與少數」以及何翠萍組織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同化與全球化」和「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深度民族誌」。現在經過編輯的過程，

¹ 研討會後，在會議論文編輯的過程中，議定由莊英章教授、麥留芳教授、蔣斌及何翠萍組成編輯委員會。而後再決定由蔣斌與何翠萍擔任本書的編輯。在此要感謝莊英章與麥留芳兩位教授的支持與協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黃應貴先生在編輯過程中的支持，所有評審人的寶貴意見，以及編輯助理張桂華小姐任勞任怨的行政支援。出席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的學者中，莊英章與林秀幸、柯志明、Erik Mueggler、Leo Suryadinata 以及 Rosey Ma 的論文將另行發表，故未能收錄在本書中。

將這些論文收錄成爲一冊，以「國家、市場與脈絡化的族群」爲主題，其實嚴格地說來，本身就是正在爲這些論文進行一定程度「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過程。當代語言人類學者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研究的重要啓發之一，就是除了肯定就意義的承載而言文本(text)與脈絡(context)缺一不可之外，更進一步導正在研究中經常出現將文本與脈絡本質化(essentialization)或實質化(reification)的謬誤，從而揭示「過程」(processes)與「表演」(performance)的重要性，將焦點由靜態的「文本」(text)轉向動態的「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由靜態的「脈絡」(context)轉向動態的「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除此之外，尤其重要的是導引出文本化過程所意味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與「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可能性(Hanks 1989; Bauman and Briggs 1990; Silverstein and Urban 1996)。²

本書論文所處理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歷史過程，及其所呈現的人類處境，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焦點：那就是某一種族群性或族群觀念被脈絡化的過程。論文中所描述分析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歷史過程，一方面構成了特定族群觀念被認知與被賦予意義的脈絡；另一方面，族群觀念與族群關係的作用，也使得這些現象與過程，有別於其他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歷史過程——它們或者透露出當今世人似乎仍然無可逃脫生活在一個族群化世界中的悲劇處境，或者是指向一個與全球化普同化願景糾纏不清，持續因爲族群意識以及受族群意識支配的資源分配不公產生紛擾，而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族群議題之所以格外具有道德的負荷，主要因爲族群性是當代思潮及論述中最容易受本質論(essentialism)拖累的觀念之一。和「親

² 文本化就意味著文本本身就可以是過程中競爭協商的產物，也意味著文本被帶離原先脈絡，放置到另一脈絡中，重新參與意義建構的可能性。文本化的過程以及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可能性，就是論述表演有效性得以發揮，同時接受檢驗、評價的場域。

屬」、「性別」一樣，「族群性」也常被賦予某種「自然」(naturalness)的意涵。即便是以列舉文化要素為基礎的族群觀念，也往往隱涵著文化傳承範圍與「血緣」傳承範圍相一致的假設。但是，誠如人類學者 Jocelyn Linnekin 與 Lin Poyer (1990:1-5) 在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一書開宗明義指出的：這種蘊涵生物、血緣或「自然」要素的「族群性」概念，其實是西方社會的一種俗民理論 (ethnotheory)，隨著「西方」的政經優勢而成為社會科學的概念。這樣的沿用，造成人類學族群研究中困擾的主要來源。對於以研究不同文化觀念與表徵體系為職志的人類學者而言，其中最為夾纏不清之處，用 John 與 Jean Comaroff 在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一文中 (1992:49) 的話說，就是：「我們究竟是把『族群性』當作分析的對象，也就是視之為一種需要被解釋的現象；還是把它當作一種解釋的原理，認為可以用它來闡明人類生存狀態中某些其他的現象？」或者用該文引用的蘇格拉底寓言來說：我們應該只是透過一面放大鏡去研究世界，還是反思地探討這面放大鏡的性質？

人類學的發展擁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就是不斷自我省視理論與概念體系中因特定個別文化觀念干擾所形成的盲點，進而尋求超越這類盲點。尤其是對於孕育人類學的「西方」社會中固有的俗民理論，往往不經意的被沿用為社會科學理論的普同性預設，更是人類學者時時提防的陷阱。親屬與性別的研究中隱涵的生物預設，就是明顯的例子。族群性的研究亦然。Linnekin 與 Poyer (1990:5-15) 依據大洋洲的民族誌資料，提出人群分類與身分界定的方式，可以分為強調「先天」特質的「孟德爾模式」(Mendelian Model)，以及強調後天特質的「拉馬克模式」(Lamarckian Model) 兩種。孟德爾模式以個體生物人的獨立自主性為基礎，認為人在出生前與出生後所獲得的特質，在本質上極為不同。出生前所獲得的特質具有可傳承性，而且在個人身分的界定上重要性較高。拉馬克模式則不對出生前後獲得的特質做明顯的區

分，而且不以個體生物人的獨立自主性為前提，反而是強調個體與環境（包括土地、食物等「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互動、學習所獲得特質對於身分界定的重要性，並且凸顯一種集體社會構成的人觀（consocial personhood）。Linnekin 與 Poyer 指出：孟德爾式的人群區辨模式，比較接近「西方」強調「出身」的族群觀念；而拉馬克模式，則是一種遍存於大洋洲的認同的觀念。在此必須注意的是：從人類學的觀點而言，即使是所謂「先天特質」，也是由文化所界定的一種認同觀念（cultural identity），而且是在某種特殊的歷史脈絡中所形成的觀念與範疇。換言之，即使是西方生物學或遺傳學所做的辨識，也無非是這些特定社會在特定歷史情境脈絡中發展出來的一種文化區辨系統。Linnekin 與 Poyer 的論點是：人群的區辨與認同，可以依據的標準相當多元，並不必然以先天出身為準，「出身」更不一定是各個時代或各個社會中始終最具支配性的認同依據。³ 因此，在族群性與族群意識的研究上，最關鍵的問題反而是：在什麼情況下，（強調先天出身關係的）族群性成爲一個社會體系中如此重要的象徵（ibid:11）？⁴ 目前一般的理解是：強調「先天出身關係」的認同，雖然並非西方所特有，但由於殖民主義的國家擴張和現代國族與國家意識的鼓吹，使得它成爲當代最普遍的一種認同形式。

3 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這裡所說的人類學文化認同的研究指的是（不同）文化對認同區辨的研究，而與多數中國研究的著作中所指的文化認同——如對「中國」、「華夏」或「漢」文化的認同——並不相同。前者有「不同文化可能有不同的認同原則」的預設，後者則無（何翠萍 1999, 2000）。詳見下節「中國認同議題的特殊性」。

4 Linnekin 和 Poyer (1990) 強烈主張：族群研究真正的目的是在探討不同民族的族群理論（ethnotheory），而不是認定他們必然有的就是出生認同的理論（亦見 Astuti 1995b:464-5）。族群理論研究的挑戰在於讓人們瞭解有另類的建構認同和區辨異己的方式。他們認爲族群性（ethnicity）是一套基於人們認爲他們是誰是緣於他們天生是誰的認知前提而來的理論。這種出生認同的理論認爲人可以依據他們的出身背景所形成在形貌和行爲上的不同而區分爲界限分明的個別群體（Linnekin and Poyer 1990: 2）。但事實上，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思考，並非所有的認同理論都是同樣的，族群性只是多種文化認同模式中的一種。

有關「孟德爾模式」與「拉馬克模式」的差別，以及「先天身分」同樣受文化所界定，在Rita Astuti (1995a, b) 在對於馬達加斯加西海岸 Vezo 人的研究中，有清楚的呈現。Astuti 發現 Vezo 是一種典型的基於拉馬克認同模式產生的人群標籤。Vezo 人是從人們「做什麼」與「住在哪裡」來建構他們特有的「族群」認同理論。在 Vezo 人的觀念中，「Vezo並不是一種人」而是「一群在海邊討生活的打漁人」。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是用人的出生的角度來區分己與異己，而是用生計生活的角度，「我是誰是因為我做什麼」，「Vezo 人就是做事像 Vezo 的人」的角度來形成認同。Vezo 人的認同強調的是人在當下的生計生活方式，而不是過去或未來。當 Vezo 人搬到內陸改做農活時，他們也就不再是 Vezo 人了。Vezo 做為一種認同的標籤，只存在於當下不斷地學習、成就和行爲當中，而沒有任何從過去或歷史所延續來的牽絆 (1995b:478)。

但是在另一方面，Astuti 也發現 Vezo 還是有另一種依據文化所界定的「先天身分」而來的認同原則，那就是對世系 (*raza*) 的認同 (1995a)。這種對世系的認同完全不同於 Vezo 人對當下「做什麼」的認同，它是對與共同埋在一個墓穴中的祖先的認同，是一種由於過去的連結所造成的天生的、不可改變的認同。與非洲相當普遍的世系認同模式頗為類似，它在人身上刻上固定且改變不了的標記。由於這兩種認同是如此的不一樣，Vezo 人清楚地區分生者的世界與死者的世界，使兩界間一方面涇渭分明，另一方面生死之間的界限又時時被生者和死者的「影子」所干擾，死者的影子常來糾纏生者，生者流動與歡愉的影子也常讓死者在被祭祀的時候流連忘返。

Astuti 的 Vezo 研究，不但呈現出一個人群可以有不只一種的認同模式，孟德爾模式與拉馬克模式可以並存，更進一步揭示了這兩種模式如何連結在一個整合的人觀脈絡中，使 Vezo 人的生存世界富有意義。尤其饒富趣味的是：馬達加斯加的地理位置，使得島上的人群，

主要分爲中央高地的南島裔族群與海岸地區混合的非洲裔與印裔族群。Vezo 的例子令我們必須自問，是應該把兩種認同模式之一視爲源自南島血親型 (cognatic) 認親原則，另一則視爲源自非洲的世系 (lineal) 認親類型的認同原則嗎？如此我們要如何解釋在 Astuti 人生與死之間的溝通與流動？Astuti 認爲：或許 Vezo 的例子正是要提醒我們：希望南島研究的人類學能意會到非洲人類學的「影子」，而非洲人類學研究也能意會到南島人類學研究的「影子」。

Linnekin 與 Poyer 清楚的說明了：孟德爾式族群觀念之流行，與殖民主義及國家體制擴張的歷史脈絡，其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在人類學的討論中，認爲「族群」無本質，其意義往往由脈絡所決定，也一直是少數具有高度共識的意見之一。不僅可以說 Fredrik Barth (1969) 對於「邊界」的強調，實際上就是凸顯脈絡的重要性；所謂的「工具論」(instrumentalism) 或者「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 or situationalism) (e.g., Cohen 1969; Mitchell 1969) 等學者，⁵ 更是以族群意識被操弄的社會脈絡爲主要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在殖民體制下市場經濟所帶動興起的多元化都市情境。即使一般討論常引 C. Geertz 爲「根基論」(primordialism) 的代表，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在〈整合革命：新興國家中的根基情感與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1973) 一文中，Geertz 整個對於所謂「根基情感」或是「根基歸屬」的討論，實際上也完全是在新興國家 (newly

5 族群研究中常被引用的人類學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和曼徹斯特學派的研究取向有密切的關係，探討的主題集中在非洲都市情境中人們如何視情境需要操弄各種以「部族」爲基礎的人際關係網絡，這些研究經常使用「部族主義」(tribalism) 一詞。此外，J. C. Mitchell (1966:52-54) 也將「族群性」視爲「範疇關係」(categorical relationship or categorical order of relationship) 的一種。範疇關係是都市的多元情境中，人們爲了日常生活的進行，以刻板印象爲基礎，將交往的對象簡化分類，據以決定應對模式的關係架構。

independent states) 的脈絡中進行的。我們可以說，Geertz 這篇文章的重點是新近獨立國家中「根基情感」所構成的聯繫對於國家穩定所形成的威脅，文中看不到他有意圖直接用「根基情感」來界定「族群性」。⁶

族群性做為人群區辨及分類觀念的一種，其結構特性與形成、發展的脈絡，在 John 與 Jean Comaroff (1992) 的〈關於圖騰意識與族群性〉(“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一文中，有至為清晰周延的討論。他們對於族群性提出了五個命題。⁷ 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第一，他們清楚地指出了普遍出現的兩種人群分類法則——族群分類與圖騰分類——二者間的異同。圖騰分類是由結構相似的群體單位所建立起的相對而言較具有對稱性 (symmetrical) 的分類體系，而且這些單位並不需要整合在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之下；族群分類則是

6 「在純粹描述的層次上」(Geertz 1973:261-263)，Geertz 列舉了這種對國家不滿的根基情感得以凝聚的焦點包括：「假設的血緣」(assumed blood ties)、「種族」(race)、「語言」(languaga)、「地區」(region)、「宗教」(religion) 和「習俗」(custom)。

7 **命題一：**族群現象並非如韋伯傳統學者的意見，源於根基情感 (primordial ties)，其實經常是由特定的歷史威力 (forces) 所產生的，這些威力既是結構的，也是文化的。
命題二：族群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事物 (a unitary thing)，它同時指涉一組關係與一種意識；而且，它對於不同社會群體所具有的意義與實際面的重要性，因該群體在社會組織秩序中的地位而有不同。但做為一種意識，它往往只是許多種「人／我」意識中的一種——圖騰意識是常見的另一種——這些不同的意識都是特定歷史結構的產物，這些意識衝撞著人類的經驗，並且制約社會行為。

命題三：圖騰意識的產生是在結構相似的社會群體間，建立起對等的 (symmetrical) 關係，這些對等的群體不一定要整合進到一個政治體系裡；族群意識的產生，則是基於結構不同的社會群體，以不對等的 (asymmetrical) 統合方式被納入單一個政治經濟體。

命題四：族群意識雖然是特定歷史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一旦形成了，就會披上一種「自然」且狀似獨立自主力量的外衣，有如一種「原則」，這種原則更足以決定繼起社會生活的走向。

命題五：當族群意識成為一個社會的集體意識中一種客體化的「原則」後，它可能會脫離產生這種意識的緣由，而依賴其他不同的因素永續存在，還可能獨立而直接的衝擊到原先產生這個意識的社會歷史情境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49-67)。

由結構上並不一定相似的群體單位所建立的不對稱的 (asymmetrical) 分類體系，而這些單位往往是同屬於一個政治經濟體制之下。所謂一個政治經濟體制，實際上指的也就是國家。或者更具體的說：就是具有一定經濟調節或是維持經濟秩序作用的殖民政體或獨立民族國家。換言之，John 與 Jean Comaroff 認為：「族群」的形成，或說以「族群性」為依據的人群分類形式的出現，必定是在某種國家體制的脈絡中，而且群體單位間往往有某種階序差異存在。其次，John 與 Jean Comaroff 也指出：一個族群意識的形成，在最初可能有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歷史因素，但是一旦形成了，就會篡奪取得一種「自然」且具有自主性的態勢。即使促使它形成的因素消失了，它還是會自主的延續下去，並且對後續的歷史發展產生影響。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摘要出這樣的理解：「族群」是人群區辨分類的方式之一，不論是具有某種生物遺傳的內涵，還是假定文化傳承與血緣傳承在範圍上有某種程度的契合，族群通常是一種強調「先天身分」的區辨觀念。但是這種強調「先天身分」觀念，卻不是「先天」上就遍存於人類社會，它是在特殊的歷史脈絡中被建構、推廣的。既有的人類學研究在指出，這個歷史的脈絡，最主要的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原動力的殖民主義擴張，以及殖民政體與後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在市場與國家的脈絡中建構並且存續的族群觀念與族群分類體系，往往內建著族群間的不平等關係。此外，族群意識的產生固然有其脈絡，這個脈絡促成了族群的「文本化」。然而族群意識一旦形成，就會篡得一定程度貌似「自然」的說服力，促成其文本性 (textuality) 相對的穩定。在歷史變遷之中，即使脫離了原來產生的脈絡，仍然可以被「再脈絡化」，由它的文本所承載的意義，與新的脈絡透過競爭與協商，產生新的意義。

本書論文所處理的歷史或民族誌現象，不論是否座落在政治疆界的「中國」境內，都與廣義的「華人」或「中國社會」有關。就如同

人類學界經常需要面對的狀況：任何以其他地區民族誌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理論，要通過普同有效性的考驗，以中國的材料進行驗證，通常都是最艱難的一關。由這些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做為族群形成、族群性建構的脈絡，不論是國家的內涵或者是市場的作用，都並不單純，而是各自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與多元的類型。猶有甚者，雖然在理論層次上，以及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我們可以將國家與市場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各自具有不同的前提與能動者 (agent)，依據不同的邏輯企圖實現各自的城府 (agenda)。但是，由本書的許多論文裡，我們也看到兩者更可以是互相為用，甚至是難以區辨的。而即使是族群、認同、文化等做為文本的核心概念，也因為「民族」(nationality) 觀念的引進，「認同」觀念的外來性 (本書王賡武文)，以及中國的族群互動歷史中「文化」概念的獨特且突出的地位，而使得情況更為複雜。本書的論文就透過對這些動態且複雜問題的探討與呈現，揭露出豐富多樣的族群意識文本化、脈絡化、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的過程。

二、中國認同議題的特殊性

圍繞著中國或廣義的華人社會發生的族群議題，對照於上述人類學的族群理論，顯得格外複雜。就國家這個脈絡而言，必須將三個特別的形塑族群界限的因素，納入考慮。其一是對於「華夏文化」或「漢文化」的認同；其二是「異族」統治的歷史所激發的「漢」或「中國」的認同；其三是社會主義中國引入史達林式的「民族」(nationality) 認同概念。按理說，以「華夏文化」或「漢文化」做為認同標準的人我區辨原則，應當只能衍生出著重後天學習的立場。⁸ 在這個立場上，

⁸ 例如韓愈《原道》中所說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